

創新性就業指標與全方位就業發展：

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新思維*

葉富強**、李碧涵***、林昭禎****、裴晉國*****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aiwan 跨 X：風險與正義 Trans-X: Risk and Justice》。2012 年 10 月 20-2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與國家發展研究所。作者要特別感謝評論人古允文教授寶貴的意見與建議。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國發所。電話: (02)33663349。E-mail: lbh@ntu.edu.tw。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臺大國發所博士生。

*****開南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主張後金融危機時期唯有建立創新性就業指標和全方位就業發展新思考，才能重新思考就業新問題的解決。我們首先就全球金融危機與總體就業做文獻回顧，其次分析危機後全球就業新趨勢，包括失業型復甦以及各勞動群體就業變動。接著建議創新性就業指標必須依各年齡層、性別、產業、及正規與非典型就業形式，而且針對勞資政三方做整合性調查分析，提供勞動市場即時資訊與分析系統，才能釐清就業新問題。本文也提出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新思考，主張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以及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讓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都能納入就業市場。本文結論強調形塑金融與勞動市場再改革新契機，才能成功脫離當前就業/失業泥沼。

關鍵字：後金融危機、全球就業新趨勢、創新性就業指標、全方位就業發展、金融與勞動市場再改革

Abstract

本文主張後金融危機時期唯有建立創新性就業指標和全方位就業發展新思考，才能重新思考就業新問題的解決。我們首先就全球金融危機與總體就業做文獻回顧，其次分析危機後全球就業新趨勢，包括失業型復甦以及各勞動群體就業變動。接著建議創新性就業指標必須依各年齡層、性別、產業、及正規與非典型就業形式，而且針對勞資政三方做整合性調查分析，提供勞動市場即時資訊與分析系統，才能釐清就業新問題。本文也提出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新思考，主張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以及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讓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都能納入就業市場。本文結論強調形塑金融與勞動市場再改革新契機，才能成功脫離當前就業/失業泥沼。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imes of post-financial crisis,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cannot be solved unless new employment indicators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are established.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global employment statu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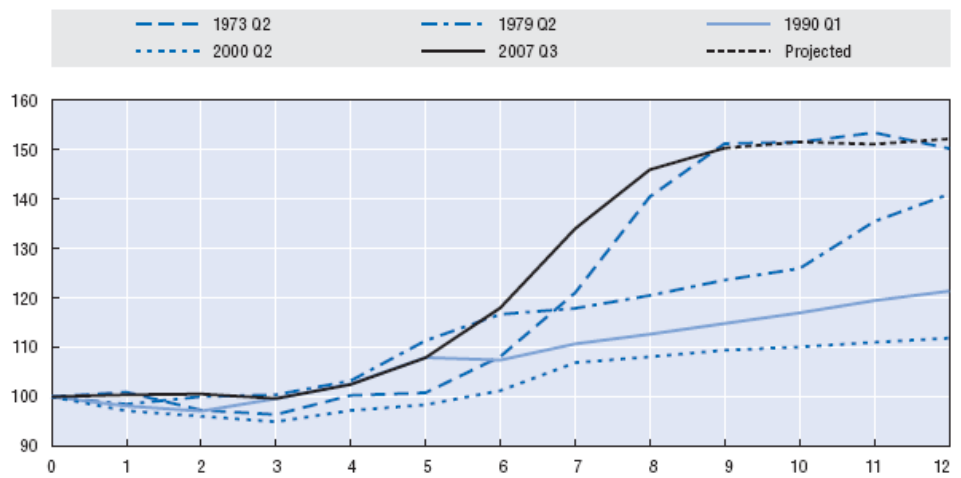
就業是各國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的重要一環，也是各國能否有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指標。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卻重創全球經濟與就業，4 年來各國政府用盡各種措施以振興經濟與創造就業，但 2009-10 年經濟復甦短暫，至今（2012 年）經濟並未完全復甦，連帶就業市場仍然非常嚴峻。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就業危機，尤其是失業型復甦，使失業率居高不下和青年失業率攀升，加上非典就業成為常態，以及婦女與高齡就業率增加等現象，都讓我們無法用原有的就業與失業指標來思考就業問題。

本文認為後金融危機時期需要有全新思維，包括創新性就業指標建立，以及由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來思考就業問題如何得到順利解決。本文首先就全球金融危機與總體就業做文獻回顧，其次分析金融危機後全球就業新趨勢，包括失業型復甦以及各勞動群體就業變化。接著本文提出創新性就業指標建立，必須依各年齡層、性別、產業、及正規與非典型就業形式，而且針對勞資政三方進行各季就業調查與即時資訊分析，將有助於三方做出正確判斷與行動。本文也提出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新思考，強調後危機時期經濟與就業問題解決在於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以及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讓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都能納入就業市場。本文結論強調必須形塑金融與勞動市場再改革的新契機。

貳、全球金融危機與總體就業：文獻回顧

2008 年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面臨戰後最嚴重的衰退，很多 OECD 國家失業率達到歷史新高點；自 2008Q3 失業率上升又快又猛，超越先前歷次經濟衰退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幅度，而且居高不下，如圖 1 所示。先前歷次衰退包括失業率最高的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失業率次高的 1978-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1990 年溫和衰退，以及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帶來的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經濟衰退後的各季

圖 1 OECD 國家失業率軌跡，依各次經濟衰退分

註：縱軸指標基礎為 100，是 OECD 各國各季失業率平均

資料來源：OECD (2010)

OECD (2009) 及 ILO (2009a, 2009b) 均指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經濟危機，在 2009 年已導致全球工作危機 (global job crisis)，侵蝕原有社會安全網、貧窮改善策略，以及勞動市場制度。尤其失業者、工作貧窮與不穩定就業者的增加，已危及數十年來的發展努力 (Lee, Wang and Ip 2011)。危機後各國政府針對失業和工作貧窮者，實行強化社會安全網措施，也增強勞工就業能力，促進其整合入勞動市場。面對工作危機，OECD (2009) 指出就業與社會政策必須有兩項優先，一是讓失業或所得不足者可以獲得足夠的財務支持，二是必須強化勞動市場政策，提供求職者再就業的資助；工作貧窮風險主要是工作時數不足，而非低時薪。但在部份 OECD 國家，徒有失業給付制度卻無法提供安全，因為很多新失業者是先前就非典型工作，而不符領取資格。

OECD (2009) 也特別提醒在高度衰退時期，上述有些措施是必須再加以修正，因為：1. 衰退時期創造出來的工作常是要探索新市場機會，而就業服務對填滿這些

新空缺是很關鍵的；2.針對長期失業高風險者，相關作法與資源必須由「工作優先」轉換成「訓練優先」；全球經濟危機已加速勞動市場結構調整，而訓練扮演極重要角色，可確保勞工備有新興工作所需的適當技術；以及 3.任何工作架構、雇用補貼或公部門創造就業計畫，應該都是暫時性的，以減少不當的成本，確保參與者能在經濟復甦啟動時找到正常工作。

儘管如此，ILO（2009a）提出過去幾次經濟危機的證據都顯示，在經濟成長回復之後，就業需要再等 4-5 年才能達到危機前的水準，而且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工作赤字（job deficit）已經非常明顯。ILO 建議新的工作法制必須刺激經濟、維持上班家庭，並處理新的工作危機。這樣的法制是就業導向，而且聚焦在受危機影響最深的人。只是 2009 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復甦曇花一現，2011 年經濟再次轉弱進入新階段，包括主要先進經濟體經濟成長停頓、有些歐洲國甚至進入二次衰退，以及新興發展中的大國則經濟趨緩。自 2008 年雷曼兄弟破產後，很多企業期待這只是暫時性經濟走緩而仍想留用勞工，但至 2011 年企業環境更不確定，經濟前景持續惡化，企業不再保留工作，加上政府財政嚴峻而使紓困規模變小，就業減緩也開始具體化（Torres，2011）。全球就業危機不僅如此，2012 年最新發展趨勢則是在上半年全球經濟面臨更大幅放緩，歐債危機使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及意大利陷入衰退，新興發展中大國，如中國大陸、巴西和印度則經濟成長明顯趨緩，都更加深就業危機。

後危機時期各國政府採取不同勞動市場政策內容，主要是要達成 4 項政策目標：勞動需求、供需媒合、所得支持和聚焦脆弱群體。有的政府為維持勞動需求，採取包括讓勞工持續保有工作的工作分擔（縮減工時）和在職訓練政策，以及為創造新工作而實施工作/工資補助和公共就業計畫政策；也有政府為媒合勞動市場供需、促進失業與低度就業者就業能力，而採取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和尋職協助、工作經驗與實習計畫、訓練和企業獎勵等；也有政府為提供所得支持而給予失業

津貼、社會救助和其它社會保障；各國政府也聚焦最脆弱就業群體（青年、婦女等），而提供上述所有政策，但主要是雇用補助與訓練方案（Cazes & Verick, 2010）。

Cazes & Verick（2010）指出，ILO 調查顯示世界各國針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因應政策重點依所得高低有所不同。高所得國家主要實施失業或可能失業勞工訓練與實習計畫政策（27 國），工作分攤策略（24 國），增加公共就業服務資源（20 國），工作/工資補貼（20 國），和放寬失業津貼申請（17 國）。中所得國家主要採取訓練政策（25 國），其次為尋職協助、企業獎勵和公共就業計畫。中低所得國家也轉向採取以前少用的創新政策，例如提供可能失業者的訓練補助。

在此背景下，我們將進一步檢視金融危機後全球就業新趨勢，並提出創新性就業指標建立與全方位就業體制，以有助於重新思考就業新問題。

參、金融危機後全球就業新趨勢分析

我們觀察到後金融危機時期全球就業呈現兩個新趨勢：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後大部份先進國家與少數發展中國家明顯出現失業型復甦（jobless growth），即經濟復甦並不同步帶動就業增長；而且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均成為歷史新高，成為各國政府當務之急。其次，金融危機對各勞動群體就業，包括各年齡層、性別、正規與非典型就業，及工作貧窮族分別產生不同程度與不同性質的影響；各國非典型就業，尤其部分工時（part-timers）與臨時就業（temporaries，包括派遣與短期契約）成為常態，青年就業率下降、婦女與高齡就業率增加，以及工作貧窮惡化等新趨勢，都有賴政府即時提出政策因應，也必須盡早建立良好的非典型就業制度，否則對非典型勞工是相當不利與不公平，也無法保有良好勞動力。

一、金融危機與失業型復甦

根據 ILO（2011）分析，若比較危機前就業高點與 2010 年就業率，先進國家中以愛爾蘭就業率下降最多，約為 -15%（減少 30 萬就業人口），西班牙其次也超過 -10%（減少 230 萬就業人口）；發展中國家以拉脫維亞就業狀況最差，其就業率下降幅度超過 -15%（減少 20 萬就業人口）。2008Q4-2011Q3 各國實質 GDP 成長（左圖）與就業（右圖）關係趨勢如圖 2 顯示。金融危機後德國與澳洲是少數先進國家經濟復甦能同時帶動就業增長。西班牙雖自 2010 年經濟小幅成長，但就業一蹶不振，呈現負成長。拉脫維亞 2008 年後經濟大幅衰退後就業深陷危機，其經濟稍後在 2010 年大幅成長，使其就業小幅增長。美國與日本在後危機時期經濟復甦並不同步帶動就業增長，呈現失業型復甦。2009Q3-2010Q2 美、日經濟復甦甚為短暫，2011 年美國就業率幾乎呈現零成長，日本甚至在 2011 年陷入經濟與就業雙雙負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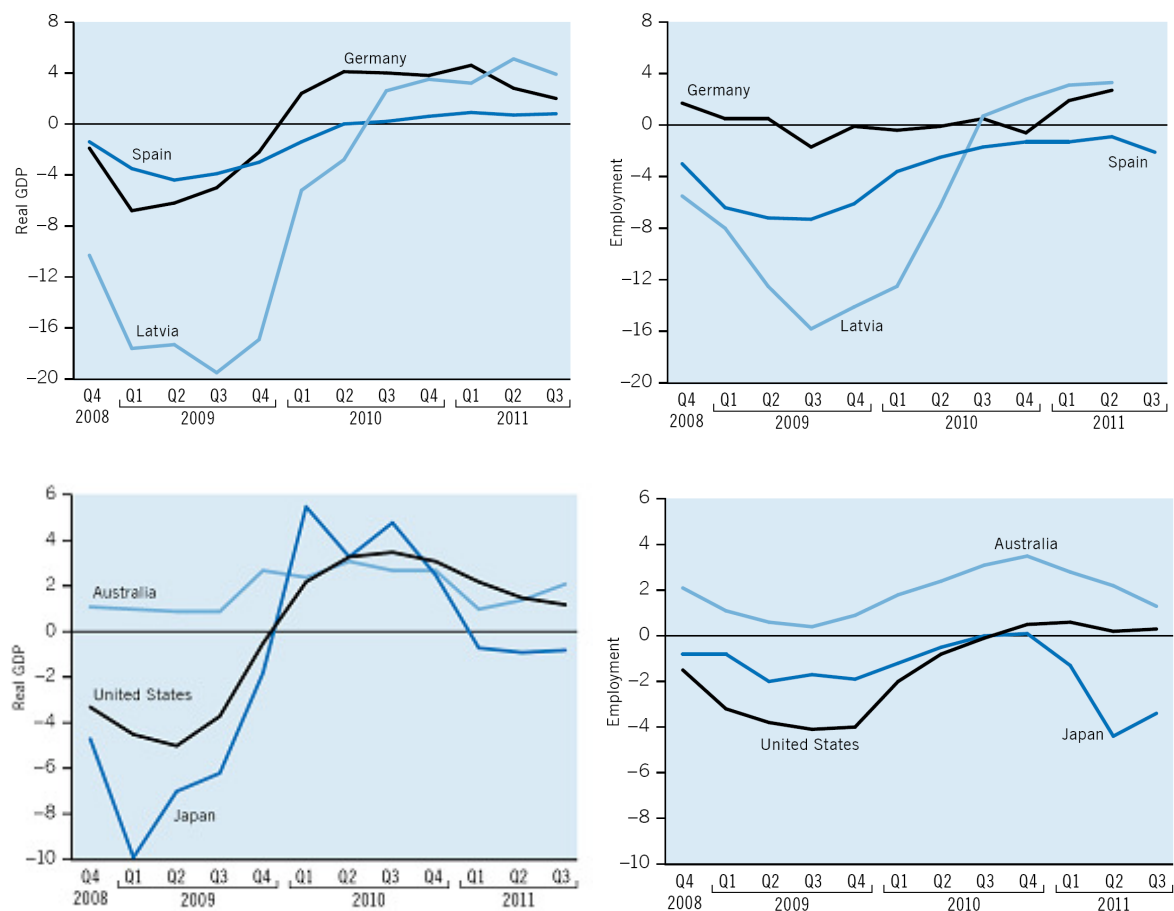


圖 2 德國、西班牙、拉脫維亞、澳洲、美國和日本 GDP 與就業之各季百分比變化，2008-2011

資料來源：ILO (2012a)，頁 48

後危機時期發展中國家 GDP 與就業變化相當分歧。中南美洲如哥倫比亞、巴西和墨西哥經濟短期受創，但就業還維持增長。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也類似中南美洲，維持就業市場增長（ILO 2012a：57, 64）。東亞香港、臺灣與韓國受金融海嘯影響經濟大幅下滑，2009 年就業率下降幅度在-2%以內，雖然遠比歐美-2~-7%為小，但已造成這些國家失業率與失業人口創歷史新高，如圖 3 顯示。2009 年台灣 GDP 與就業是亞洲四小龍跌幅最深的；雖然之後經濟成長反彈大，就業也回升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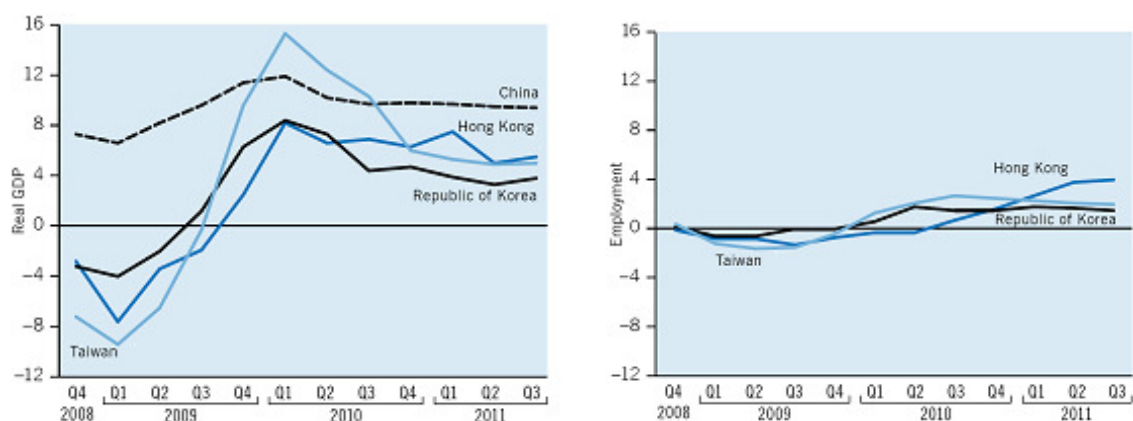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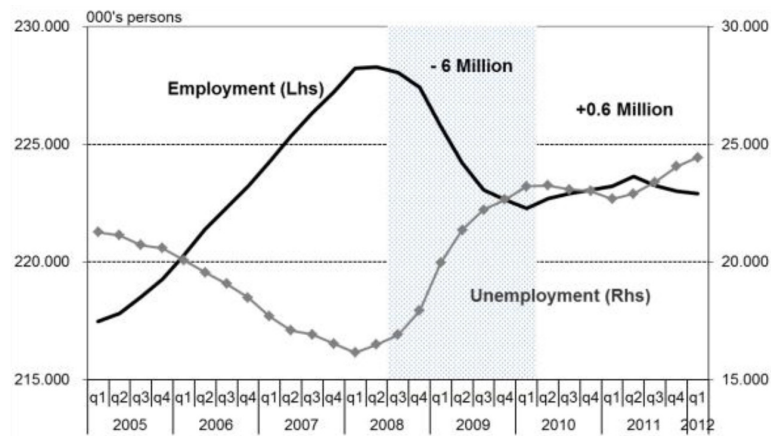


圖 3 香港、臺灣、韓國與中國大陸 GDP 與就業，各季百分比變化，2008-2011
資料來源：修改自 ILO (2012a)，頁 60

若比較圖 2 與圖 3，我們發現歐美就業率下降幅度遠比東亞深，社會衝擊很大。南歐 4 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出現大規模示威，抗議高失業率（尤其是超高青年失業率）以及（2011 年）歐債危機後的政府緊縮政策。美國也有占領華爾街行動（Occupy Wall Street），抗議高失業率、企業貪婪與政府紓困金融業的不公不義。2009Q3 歐美 GDP 回復成長是政府紓困、金融產業重操舊業和奢侈消費而帶動的經濟成長，而就業到 2009Q4 後才回升一點。2011 年夏天歐美有些國家又幾乎出現二次衰退，經濟瀕臨泡沫化，再度裁員或放無薪假。可見歐美經濟復甦力道比亞洲小、就業率下降幅度也比亞洲深，而且歐美經濟回復正向成長時，就業幾乎是負成長，即出現失業型復甦，只有德國與澳洲例外。

歐盟是先進國家失業型復甦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歐盟在 2008Q3-2010Q1

減少 600 萬就業人口，如圖 4 顯示。至 2012Q1 就業市場也只增加 60 萬回來。歐債危機使歐盟失業型復甦更為惡化，2012Q1 失業人數超過 2400 萬，為歷史新高，南歐各國如希臘、西班牙更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超過 20%。



就業人數(千人)

失業人數(千人)

圖 4 歐盟 27 國就業與失業，2005-2012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頁 13

二、金融危機後各勞動群體就業與工作貧窮變化

金融危機對各勞動群體就業的立即影響各有不同，圖 5 顯示 2008Q4-2009Q4 OECD 各國總就業率減少-2.2%，女性就業降低-1.2%，男性就業縮減-3.0%。其中有 3 個群體就業受創最深：分別是青年（15-24）（-8.4%）、低技術（-6.4%）、臨時就業（-7.7%）；只有 2 個群體就業增加：高齡（55+）（1.7%）、高技術（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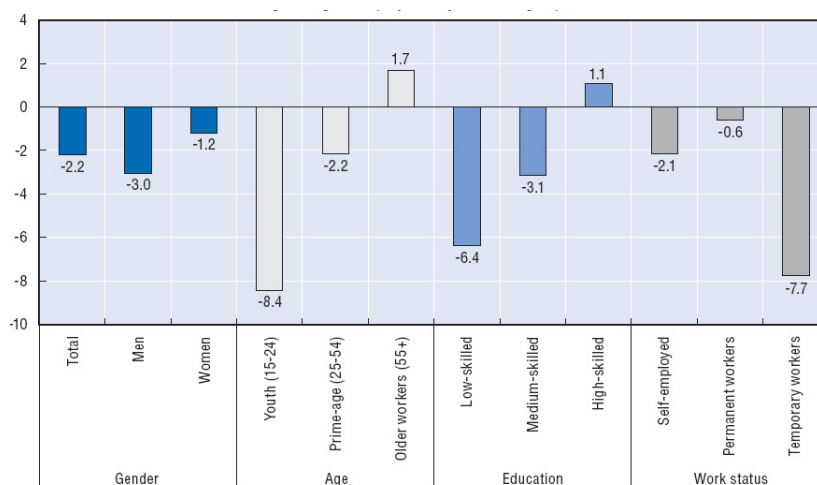


圖 5 各勞動群體就業變動百分比，2008Q4-2009Q4

資料來源：OECD (2010)，頁 22

若分別檢視部分工時與臨時就業受金融危機影響，ILO (2012b) 指出 2010 年大部份國家呈現部分工時就業佔總就業人口 (15-64) 比率較 2007 年增加，例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冰島、愛爾蘭、奧地利、瑞典和丹麥，如圖 6A 所示。圖 6B 顯示同期臨時就業佔總就業比率下降國家包括西班牙、韓國、瑞典、挪威、立陶宛、斯洛維尼亞；但有些國家臨時就業比率增加，例如匈牙利、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愛爾蘭、希臘、葡萄牙。韓國與日本均呈現部分工時就業比率增加，臨時就業比率下降。各國部分工時就業比率大致維持在 25% 以下，臨時就業比率約在 20% 以下；但 2010 年荷蘭部分工時就業率高達 50%，臨時就業率 15%；德國部分工時就業率是 25%，臨時就業率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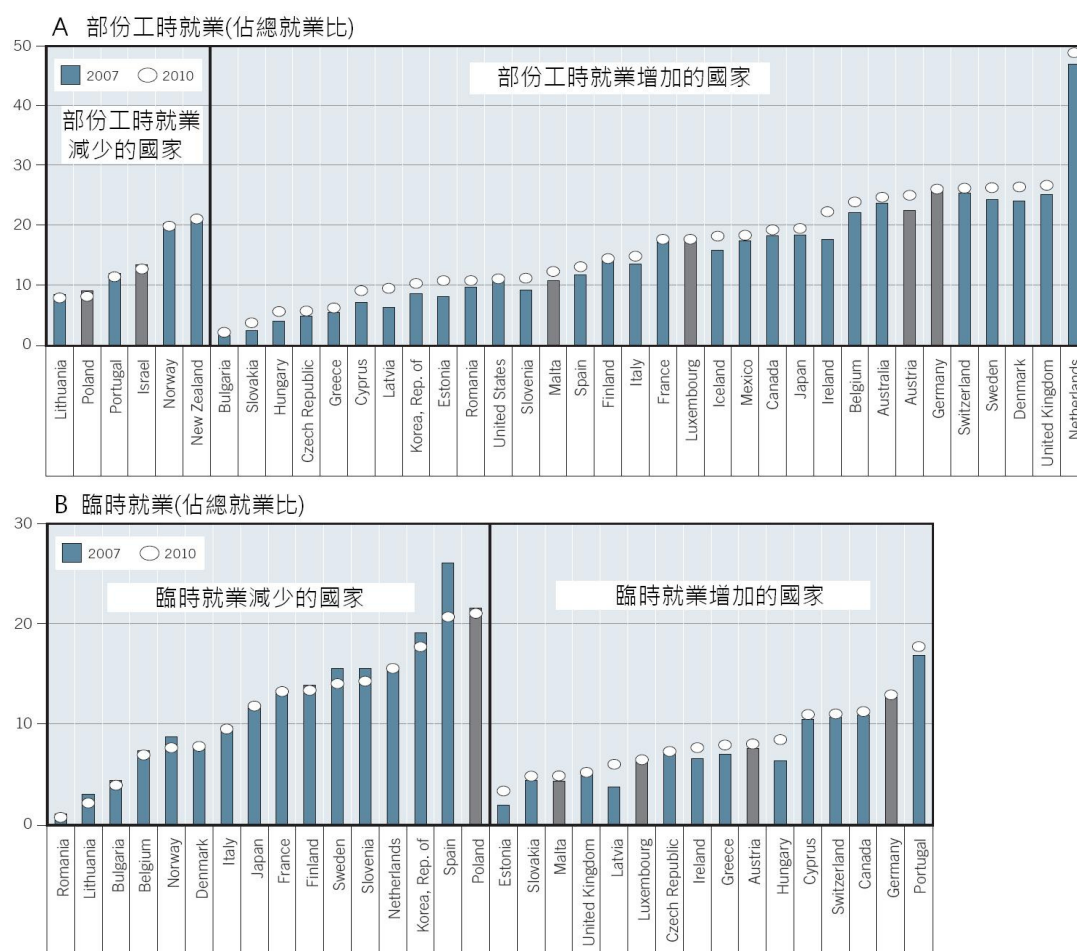


圖 6 各國部分工時與臨時就業比率，2007、2010

資料來源：ILO (2012b)，頁 7

我們進一步發現大部分國家 2010 年非自願部分工時與非自願臨時就業比率比 2007 年提高，而且非自願臨時就業比率高於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比率，如圖 7 所示。圖 7A 顯示同期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增加者如愛爾蘭、拉脫維亞、斯洛伐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立陶宛、日本、愛沙尼亞、美國、英國、俄國。圖 7B 也顯示同期非自願臨時就業比率上升國家如愛爾蘭、丹麥、英國、捷克、拉脫維亞；下降國家有奧地利、荷蘭、斯洛維尼亞和比利時，而且奧地利、德國和荷蘭有全球最低的非自願臨時就業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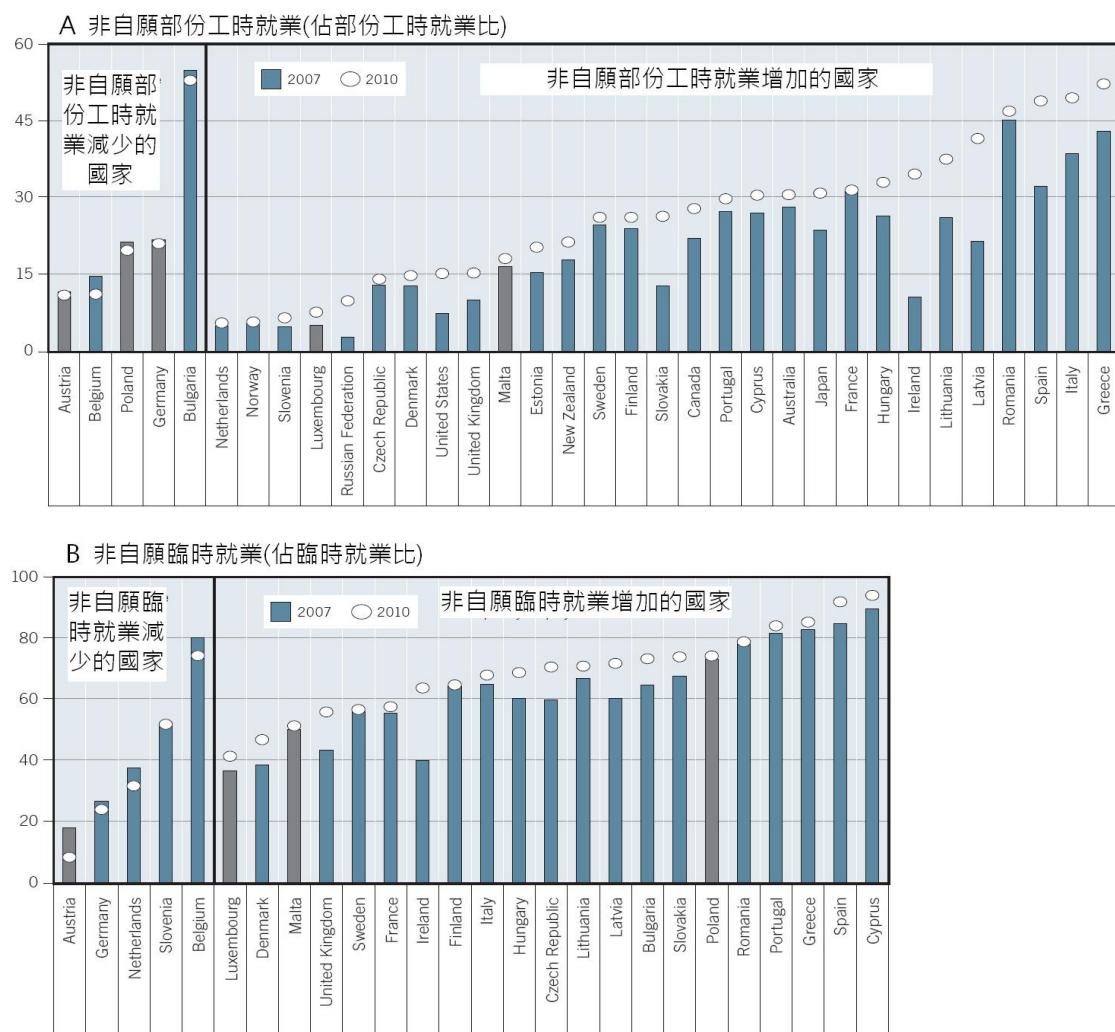


圖 7 各國非自願部分工時與臨時就業率，2007、2010

註：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指就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是僅管想要、但卻無法找到全時工作。非自願臨時工作指就臨時工作的原因是無法找到永久工作。

資料來源：ILO (2012b)，頁 8

歐盟執委會資料顯示在 2011 年歐盟部分工時就業比率是 18.8%，男性有

8.1%、女性 31.6%、青年 29.7%是部分工時勞工。荷蘭部分工時就業佔總就業比率高達 48.5%，不論在男性、女性或青年部份，幾乎都是歐盟最高的，男性有 24.3%、女性有 76.5%、青年有 75.2%，是部分工時勞工。荷蘭則有全球（除俄國外）最低的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比率，不論就男性、女性或青年，其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比率分別只有 9.4%、6.5%和 7.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 81)。

我們又觀察到後危機時期歐盟臨時與部分工時就業趨勢有所不同：臨時就業增減明顯同步反應經濟景氣或不景氣，部分工時就業則不管經濟變好或變差，持續受到企業青睞。首先，圖 8 顯示危機前後歐盟永久（permanent）、臨時與自雇（self-employed）就業變化趨勢，2008Q2 臨時勞工先被裁員，2010Q2 經濟變好時很快又被雇用；2009Q1 永久就業大減，2011Q1 才重回就業市場；自雇就業趨勢類似臨時就業，但 2011 年歐債危機後自雇就業呈現負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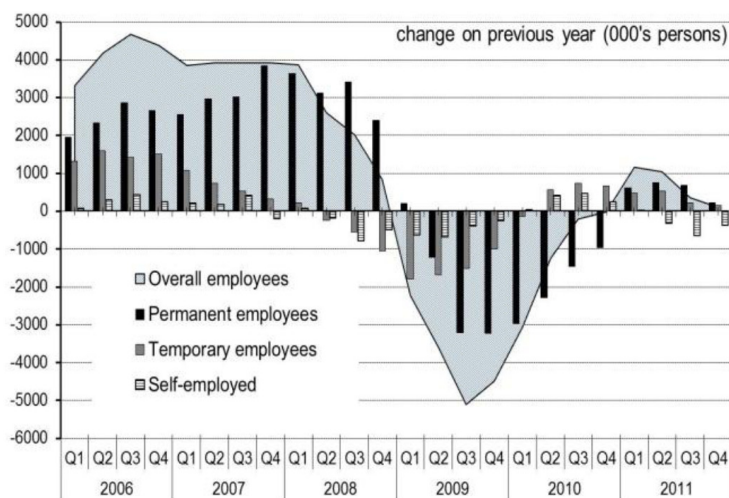


圖 8 歐盟永久、臨時與自雇就業變化(15-64 歲)，2006-2011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頁 26

金融危機後歐盟永久就業驟減，直到 2011Q1 才有正向增長，青年與中壯年永久就業在 2009-2010 深受危機衝擊而大減；唯有高齡永久就業雖數量稍減但仍維持成長，歐債危機後更是逆勢成長。若就歐盟臨時就業觀之，早在 2008Q2 就呈現負成長（永久就業在 2009Q1 才如此），但當景氣回升在 2010Q2 呈現就業增長（永久就業遲至 2011Q1 才如此）。金融危機對中壯年臨時就業影響最大，對青年影響

次之，對高齡臨時就業影響不大。2010Q2 景氣回升中壯年臨時就業大量回升；但青年臨時就業增加不多，歐債危機後又縮減（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 27）。

圖 9 顯示歐盟部分工時與全時就業變化，2008Q2 全時就業陸續減少，2009 年大量減少，2011Q4 再次負成長；部分工時就業呈現穩定。就不同年齡群而言，高齡部分工時就業呈現穩定，很少受景氣影響；中壯年部分工時就業在危機後逆勢成長，2010 年經濟回復景氣時也大幅增加，到歐債危機後被高齡部分工時就業大量取代（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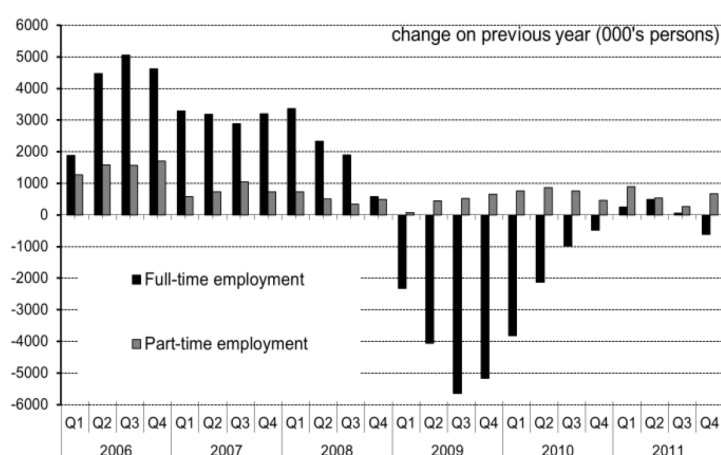


圖 9 歐盟部分工時與全時就業變化，2006-2011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頁 27

歐盟執委會資料顯示部分工時、臨時或工作未滿一年者，比全時、永久勞工或全年工作者有較高的工作貧窮率（in-work poverty rate），大幅高於歐盟 27 國平均（8%），如圖 10 所示。顯見部分工時或臨時就業者有較高比率陷入工作貧窮狀況。2010 年歐盟部分工時工作貧窮率以荷蘭為最低（5%），羅馬尼亞最高（56%）；同年歐盟平均工作貧窮率是 8.5%（最高的是羅馬尼亞 17.3%），平均無工作家戶比率增加為 9.9%（最高的是比利時 12.6%）（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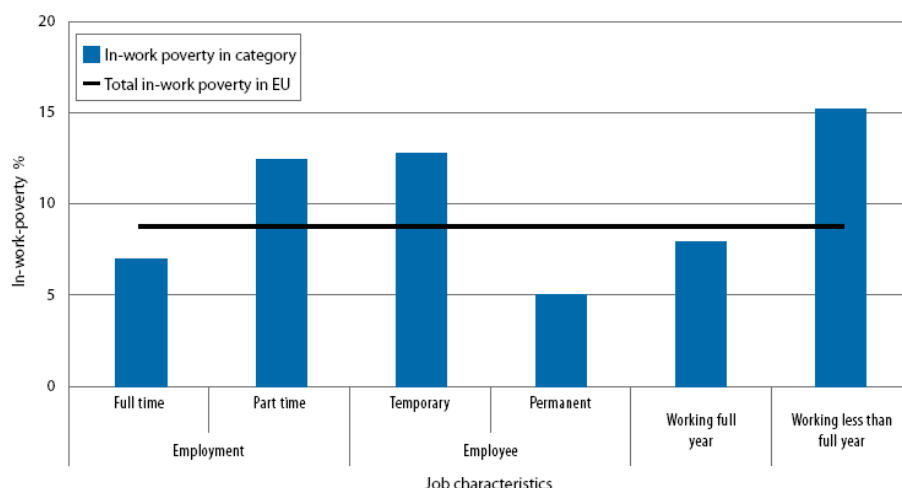


圖 10 歐盟工作貧窮依工作特徵分，2009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1)，頁 144

後金融危機時期永久就業機會縮減，青年與中壯年因失去永久就業或進入臨時就業而對其事業與家庭影響深遠，婦女則因大部份從事部分工時與臨時工作而造成低所得和女性單親家庭生活貧窮等問題。事實上，金融危機對弱勢就業群體負面影響相當大，使青年、婦女和低薪工作者所得與工作滿意度都大幅下降（Lee, Wang and Ip 2011）。

肆、創新性就業指標的建立

上述全球就業新趨勢分析顯示全球金融危機對就業市場的重大衝擊，已造成就業版圖的全新變動。先前有關就業、失業的就業指標已無法分析當前就業市場發展特質，故需要創新性就業指標，蒐集新資訊以探究勞動市場新變化。本文提出台灣要建構創新性就業指標，分別依各年齡層、性別、產業、及正規與非典型就業形式，而且針對勞資政三方做整合性調查分析，提供勞動市場即時資訊分析系統，將有助於勞資政三方對勞動市場供需與動態做出正確判斷與行動。針對勞方尤其要調查分析就業者或尋職者就業型式與條件、自願或非自願就業、就業生涯選擇等；針對資方/企業要調查企業信心、聘雇策略與薪資結構；以及針對政府要調查訪談其對經濟與就業政策因應，如此才能提供就業設計的創新性思考基礎。

台灣目前就業指標仍不足以調查與分析後危機時期實際的就業變動趨勢，應該要有各季資料以及其它各項創新性就業指標，以作出詳盡統計分析圖表。建議台灣要有各式就業新指標，不能只用先前就業（勞動力人數—就業和失業人數、各部門就業人數）、失業，以及勞動參與率（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別）資料。台灣臨時與部分工時就業雖已有行政院主計處每年 5 月公佈的調查資料¹，部分工時另外有行政院勞委會自 2001 年每隔幾年進行的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²，但應該有臨時與部分工時就業各季變動資料，以及非自願就業資料，雖然在勞委會部分工時調查中已有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調查題目。

本文提出創新性就業指標建構與就業新資訊提供，必須針對總體/永久/臨時/自雇就業、總體/全時/部分工時就業、青年就業、性別就業、（中）高齡就業和工作貧窮率等做調查分析，分別詳述如下。

一、總體/永久/臨時/自雇就業指標，依各季、性別、年齡層、產業別分

另外，臨時就業新指標要包括：

- （一）各季臨時就業增減
- （二）臨時就業的主要原因
 - 1. 無法找到永久工作
 - 2. 不想要有永久工作
 - 3. 教育或訓練階段
 - 4. 試用階段
- （三）非自願臨時就業比率（上述原因 1. 成為認定非自願臨時就業的標準）

二、總體/全時/部分工時就業指標，依各季、性別、年齡層、產業別分

另外，部分工時就業新指標包括

¹ 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處 2011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統計，2010 年台灣非典型就業達歷史新高 72.3 萬人，占總就業 6.9%；其中部分工時 38 萬人，臨時或人力派遣 54 萬人（但兩者有重複計算）。15-24 歲勞動人口中，非典型就業占 25%，為各年齡層之冠。2011 年非典型就業降為 69.3 萬人，占總就業 6.5%；部分工時 37.8 萬人（佔 3.54%），臨時或人力派遣 53.1 萬人（佔 4.97%）。2008-09 年總就業減少 17 萬人，但非典型就業增加 3.7 萬人。2010-11 年景氣好轉與政府短期促進就業措施退場影響，總就業增加 21.1 萬人，但非典型就業減少 3 萬人。此調查資料已進一步依就業者之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主要工作職業，以及工時等加以分析。

²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也特別針對家庭主婦做此調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此一調查，2011 年台灣部分工時勞工有 10.3%每週工作 40 小時以上。故各國用 30 或 35 小時作為部分工時工作標準是會得到低估的資料。

(一) 各季部分工時就業增減

(二) (台灣已有) 自願與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主要原因

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主要原因：

1. 能選擇工作時段
2. 貼補家用
3. 目前還是學生
4. 對工作內容感興趣
5. 工作比較簡單
6. 打發時間
7. 想縮短工作時間
8. 幫忙親友
9. 可以馬上離職

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主要原因：

1. 無法找到全時工作
2. 學校實習
3. 家庭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4. 體力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5. 公司業務緊縮縮短工時

(三) 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比率 (上述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主要原因 1. 成為歐盟認定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的標準)

三、青年就業指標

上述全球就業趨勢分析指出青年就業面臨不利發展。而且早自 1990 年代已有轉銜勞動市場理論 (transitional labour market theory) 與 Yo-Yo 理論論述青年就業之不穩定特質，主張結合勞動市場與生命歷程，以及政府必須提供轉銜青年收入保障與訓練諮商等支持性措施 (Schmid 1998, 2008；李易駿和古允文 2007；謝文元和李易駿 2007)。後金融危機時期我們需要有最新即時調查分析，瞭解各季青年就業軌跡和面臨的新問題，並探究非典型就業是否成為青年就業的陷阱或機會 (trap or opportunity)。當前全球青年失業嚴重，青年就業新指標與調查資料分析就成為重新思考青年就業/失業問題的重要資訊基礎。本文建議青年就業新指標應包括如下：

(一) 青年永久/臨時/自雇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二) 青年全時/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三) 青年自願/非自願臨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四) 青年自願/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五) 青年失業人數與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六) 青年尼特族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EET) 變化，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七) 青年對職業生涯的新看法與未來就業期望，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四、性別就業指標

上述就業分析已得知婦女就業率提升是拜部分工時就業不斷成長之賜。在荷蘭女性有 76.5%是部分工時勞工，但也造成部分工時婦女收入只有男性家計負擔者的三分之一，形成所謂一又三分之一就業家庭 (Lee, Wang and Ip 2011)。ILO (2012d) 勞動市場重要指標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研究也討論婦女部分工時就業是否有助於兩性平等，因為即使婦女就業率持續提升，但其就業特質如就業地位、低度就業與工資都仍然比男性差一截。台灣仍需要調查分析更多資料才能瞭解、論述上述問題。

ILO (2012d) 提出勞動市場性別就業指標包括：(一) 婦女(25-60)勞動參與率，(二) 學齡前(0-6)母親勞動參與率，(三) 雙薪家戶比率，(四) 男性家計負擔者家戶比率，(五) 職業隔離指數，(六) 性別工資差距比率，(七) 所得最高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八) 所得最低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以及(九) 女性單親貧窮率，如表 2 所示。就以上性別就業指標，三種福利資本主義體制 14 個國家³的比較結果顯示，北歐社會民主體制即使職業隔離指數最高(61%)，但婦女勞動參與率(80%)、學齡前母親勞動參與率(78%)以及雙薪家戶比率(85%)都是三種體制中最高。自由體制因勞動市場管制少而有最高的性別工資差距比率(20%)以及女性單親貧窮率(49%)。統合體制則有最高的男性家計負擔者家戶比率(39%，南歐義大利與西班牙則更高達 58%)，及所得最高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16%，南歐義大利與西班牙高達

³ 社會民主體制國家包括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自由體制有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統合體制包括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和西班牙。

19%)。北歐社會民主體制所得最高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為最低(11%)，顯示其仍然限制婦女進入權威位置。社會民主與自由體制同樣有較高的最低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27%)。台灣也應建立這些指標資料，再與之做比較分析。

表 2 勞動市場的性別就業指標，依 3 種體制分

	社會民主體制	自由體制	統合體制
婦女(25-60)勞動參與率%	80◎	71	56(41)
學齡前(0-6)母親勞動參與率%	78◎	63	50(42)
雙薪家戶比率%	85◎	68	48(28)
男性家計負擔者家戶比率%	9	21	39(58)◎
職業隔離指數	61◎	53	54(51)
性別工資差距比率%	16	20◎	11(7)
所得最高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	11	13	16(19)◎
所得最低五分位工作婦女比率%	27◎	27◎	25(25)
女性單親貧窮率%	6	49◎	26(23)

註：括號內是南歐義大利和西班牙

資料來源：ILO (2012d)，chapter 1 B

台灣應有這些性別就業新指標，再與不同體制國家婦女就業指標相互比較，進而分析討論台灣婦女就業特質與問題。我們也提出性別就業新指標應再包括：

- (一) 性別永久/臨時/自雇就業變動，依各季、年齡層、產業別分
- (二) 性別全時/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年齡層、產業別分
- (三) 性別自願/非自願臨時就業變動，依各季、年齡層、產業別分
- (四) 性別自願/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年齡層、產業別分
- (五) 性別失業人數與失業變動，依各季、年齡層、產業別分

五、高齡就業指標

全球金融危機後，歐盟高齡就業佔全體就業比率持續提高，一方面表示高齡勞工健康狀況良好、企業與社會需要他們的工作經驗，或他們願意繼續工作，但另一方面卻是國家規定延後退休年齡、家中年輕人沒有工作，或個人財務需要。德國因國家財政吃緊，政府宣佈逐年延後退休年齡，目前延長到 67 歲，以後將延後到 70 歲；美國則對高齡就業提供相當友善的環境，高齡就業流動性低，且要的

薪資不高。高齡勞工若繼續工作，也可能要面臨職場新挑戰。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鑑於 2012 積極老化（productive ageing）歐洲年，故進行一項歐洲變遷新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60%歐洲人相信在退休後會繼續工作，1/3 想工作更久一點，而且越接近退休者比年輕世代有更高比率持有此看法。大部份歐洲國家規定領全額退休金的年齡是 65 歲，但退出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在 2009 年)是 61.5 歲。調查發現 1/3 歐洲人說當年屆退休時會想繼續工作，而且 2/3 歐洲人認為部分工時工作與領部份年金（partial pension）是比完全退休更具吸引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12b）。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11）另一項調查研究也顯示全球金融危機後，2009Q3-2011Q1 高齡就業變動呈現性別差異。男性高齡就業比率大幅下降至 2010Q2 低點(因被裁員)，稍後有回升，但女性高齡就業除 2010Q2 外持續增加。歐盟男性高齡就業比率變化反映經濟緊縮，因高齡雇用或解雇成本較高，使男性高齡勞工在經濟衰退深化時比女性高齡者有較多被解雇，但經濟變好時又較少被雇用。女性高齡就業較少受景氣循環影響，尤其在女性就業比率較高部門如照護與教育部門。在 2006Q1 歐盟男性就業有 12%是高齡就業，女性則約有 11%；2011Q1 男女高齡就業比率分別上升 2%，達 14%和 13%；2008Q4-2009Q2 金融危機最嚴重時，男性高齡就業比率增加 0.15%，女性高齡就業增加 0.25%。我們很需要針對高齡就業新趨勢加以調查分析，故建議高齡就業新指標應包括：

- （一）高齡永久/臨時/自雇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二）高齡全時/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三）高齡自願/非自願臨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四）高齡自願/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 （五）高齡失業人數與失業變動，依各季、性別、產業別分

六、工作貧窮率指標

工作貧窮率指就業者與其家戶成員之平均生活水準低於貧窮線，也是衡量就

業者是否擁有尊嚴工作的標準（ILO, 2012e）。我們建議工作貧窮率新指標要依各季、總體/永久/臨時/自雇就業、總體/全時/部分工時就業、性別、年齡層和產業別，加以調查分析。

本文提出的創新性就業指標也必須針對資方/企業/雇主做就業調查，此調查包括 1.企業信心（對經濟前景看法）2.聘雇策略 3.薪資結構（底薪、獎金或津貼）。另外也要針對政府各經濟與就業決策單位做調查訪談，如勞委會、各縣市勞政單位、經濟部、工業局、國貿局等，以了解經濟發展策略與前景，及就業問題的因應政策。此創新性就業指標與其後續就業調查是一項勞資政三方的整合性就業調查。

至於問卷調查部分，則必須針對上述創新性就業指標，加以設計勞資政三方的調查問卷。也要針對勞工的就業形式（永久/臨時/自雇、全時/部分工時）設計問題，而且個人基本資料要包括年齡、性別、產業別、薪資（時薪、週薪、月薪、年薪）、工時、公私協力、勞健保、退休提撥、企業福利，以及工作滿意度等。

在探討創新性就業指標之後，我們接著要提出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的新思考。

伍、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的新思考

就業問題有解嗎？絕對有！我們認為化解就業危機之道首先在於經濟，其次才是就業本身。就業問題的首要根源在經濟，經濟若有成長就可創造就業；但經濟必須持續成長，而非大起大落，否則經濟並沒有真正復甦，企業對經濟前景不看好，非但不願增加雇用全時正職勞工，只可能增加雇用非典型勞工。故本文提出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指就業體制是一種制度安排，是由國家、經濟（市場／企業）與市民社會之關係共同組成、界定。因此我們主張要改革金融資本主義使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以及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資源，共同拯救經

濟與就業。下面分別討論之。

一、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都肇因於金融市場開放使得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全球金融投機盛行，21 世紀初各國實行寬鬆貨幣政策以振興經濟，卻又進一步推高全球金融投機，終而造成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一發不可收拾，而就業首當其衝，眾多就業/失業者深受其害。後危機時期解決就業問題的首要課題是要檢視金融危機的根源，也就是要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才能活化就業市場。故政府要像瑞典與德國一樣，有道德勇氣管制高風險、高獲利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當操作，以確保長遠、穩定的經濟成長（李碧涵、徐健銘，2010）。若不改革金融資本主義，則未來經濟仍會像後危機時期這 4 年裡，只出現短暫經濟復甦又隨之再次衰退，造成經濟前景不明、企業信心不足而不願聘雇正式員工或選擇使用臨時或部分工時員工，形成當前就業市場核心問題所在。

其次，政府在振興經濟或創造經濟成長時，必須同時帶動就業活化與成長，才可能有創造就業的成長（job-rich growth）。圖 11 顯示 2007-2010 年各國失業率與投資/GDP 比率變化：左半邊國家投資/GDP 下降、失業率上升，失業率甚至有大幅上升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愛爾蘭、西班牙和美國，左半邊國家只有德國投資/GDP 比率下降（約 2%），失業率也下降（至少 2%），部分歸因於實施縮減工時，留住員工；圖右半邊顯示投資/GDP 比率上升大都會使失業率下降，除了台灣、突尼西亞、香港、智利和中國大陸的投資成長並不帶動失業率下降，顯示政府振興經濟無助於解決失業。台灣的走勢與德國正好相反，投資/GDP 比率上升（不到 1%），但失業率也上升（超過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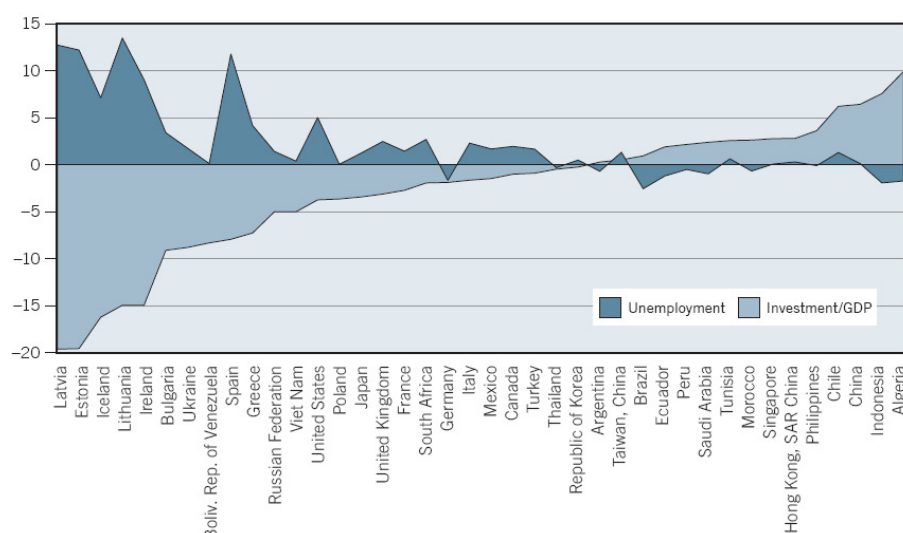


圖 11 各國失業率與投資/GDP 比率變化，2007-2010

資料來源：ILO (2012b)，頁 87

二、共同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讓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都能納入就業市場

政府除了上述要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並且採行創造就業的成長策略之外，也應針對經濟結構核心問題與不同就業群體需求，提出適當政策，而不僅是經濟紓困而已。經濟結構尤其是指企業結構大小之分。政府要提出獎勵小企業、發展多樣經濟（diverse economy）的政策。例如實施公平競爭法，確保大企業無法不公平擠壓小企業，政府也應在資金與空間上給予發展地方經濟更多支持。相較於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如圖 12 顯示，更需要政府融資協助或投資支持。2001-2006 年不論美國、歐元區、亞洲和中南美洲，小企業年平均投資成長率均高於中或大型企業；2007-2010 年受危機影響歐元區小企業年平均投資成長率呈現大幅負成長，美國也是小幅負成長，而且歐美小企業投資成長率負成長幅度遠大於中或大型企業。在亞洲雖然小企業投資成長率仍為正向成長，但低於大企業。拉丁美洲小企業投資成長率比起大企業低很多，中型企業甚至是有投資負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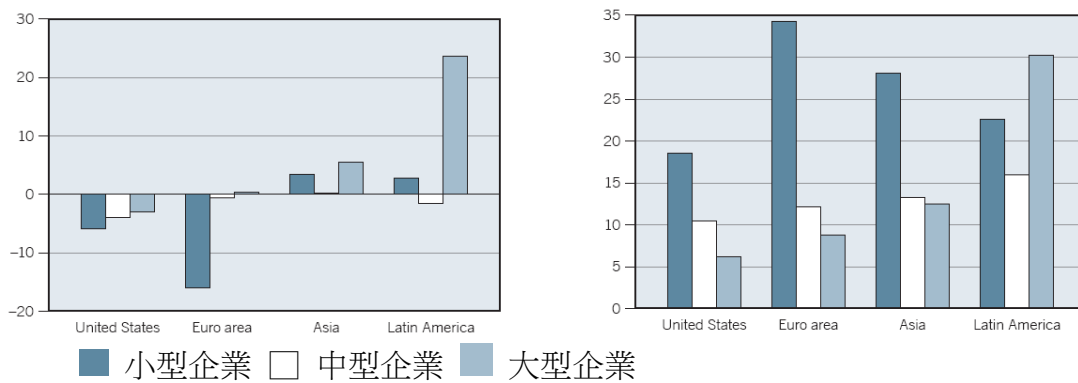


圖 12 年平均投資成長率，依企業大小分，2007-2010（左圖），2001-2006（右圖）
資料來源：ILO (2012b)，頁 88

政府也要提出確保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的政策，重新檢視造成社會兩極化的經濟政策，因為富者愈富而勞工生活愈來愈不安全狀況，已造成不永續社會發展。確保社會公平應是政府未來第一優先考量的經濟社會政策。而且各國經濟是鑲嵌在整體社會發展，意即經濟成長與企業獲利鑲嵌在社會總體之上，唯有整體社會有發展、全民有購買力，才能支撐長遠的（企業）經濟成長。

針對就業本身，尤其是在彈性就業改革方面，政府部門刻不容緩的課題是必須重新檢視勞動市場政策、改善彈性就業條件，以及重視勞工基本權利與生活品質。到底非典型就業是走向正職工作的過渡階段呢？或成為工作貧窮的陷阱呢？其核心議題仍然是就業彈性與安全的問題，故如何對非典型就業加以規範以保障非典型就業者，仍然是政府重要的把關職責。政府若要推動彈性就業，例如荷蘭⁴與德國，則政府責任不可退縮，要強化就業保障與社會保障，以及積極就業媒合；也要推動企業給予彈性就業者較佳的工作條件，以及與工作時數相對應的福利與就業保障。臺灣應要參考荷、德、韓、日等國對彈性就業的勞動規範，以訂出臺灣的遊戲規則；並且要訪視目前企業彈性運用勞工的方式，找出勞資實際面臨的問題，對彈性就業訂出公平合理的勞動法。

⁴荷蘭部分工時勞工享有與工作時數相對應比率的各項福利與就業保障，如企業福利、健保、就業保險。

除了政府行動，企業社會責任更不可少。企業在創造經濟成長同時，也要確實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不可輕言裁員，以維護人力資源。企業不能只以獲利為唯一目標，創造就業也應成為企業營運的目的；北歐國家認為企業獲利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故企業要給予各種就業形式的勞工較好的工作條件，以永續保持勞動力與經濟社會發展。歐盟提出整合企業社會責任與地方就業發展計畫（Loc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 LED），共創經濟與就業，使社區與企業能有如下交集而共同受益：1.發掘合作夥伴之專業技術與知識，2.鼓勵在地合作，3.改善在地經濟狀況，4.在地就業市場供需有較好的匹配。如此市民社會也能共同創新在地經濟發展，若政府與企業能再與公民社會合作，資助在地企業發展，將可形成創造就業的新形式（Mandl, 2009）。

金融危機後歐盟透過雙方或三方社會對話，以不裁員方式解決就業與失業問題，共度危機。德國透過縮減工時使德國人不失業。新上任的法國總統歐蘭德廢除加班費免稅優惠，並且縮短工時從 39 小時降低到 35 小時，目的在於希望企業能增聘員工，而非以現有員工超額加班的形式來因應危機後的經濟復甦。後危機時期我們必須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共同攜手合作拯救經濟與就業，讓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能完全納入就業市場：

〈一〉青年就業－開發創意興趣

青年就業重點在於開發創意興趣，讓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成為青年一生的志業（from job to career）。我們特別建議成立青年發展中心，協助青年開發興趣、潛能，提供教育/職業訓練課程與計畫。針對臨時或部分工時的青年飛特族（freeters）和自雇的蘇活族（SOHO），政府要為他們提供妥善的權益保障，也要增加可運用資源以提升知識與技術，使青年即使面臨裁員、轉換工作等問題，仍具有終身學習和永續就業能力。當然青年也需適度調整工作價值觀，保持跨界學習、創新的精神，開拓特殊專長，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唯有做自己真正有興趣的事情，

才能樂在工作，成就自己，服務社會（鄭凱文 2010；鄭凱文、李碧涵 2010）。

ILO（2012c）建議青年就業政策應有如下幾個重點：1.總體經濟與成長政策。政府若財政許可，必須創造青年就業，即青年就業應是最優先國家政策議題，但各國政府提出的青年計畫經常不具規模，無法給予青年足夠經費資源。2.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與計畫。積極勞動市場措施，例如公共就業服務、薪資與訓練補貼或減稅，能鼓勵雇主雇用年輕人。同樣重要的計畫是要解決青年技術不當匹配，如職訓、失業者再訓練、創造或改進實習（學徒）體系、創業訓練計畫，和弱勢青年生活技能訓練等。3.改善青年生活保障。勞動市場改革應順著青年需求，給青年較佳社會保障。尊嚴就業不只是創造工作機會而已，而且是要改善工作品質。4.建立社會對話與夥伴關係。為青年就業建立廣泛夥伴關係，以實現青年就業承諾。政府、雇主、工會與其它組織之夥伴關係可決定在全國或地方層次提倡青年尊嚴就業的最適行動。5.支持強大的勞動市場資訊分析系統。提供監控勞動市場，以及設計與實施有效青年就業政策的最好基礎。

〈二〉婦女就業－發展技能成就

我們主張婦女就業焦點在於幫助婦女發展技能和成就。ILO 和 WTO（2011）提出必須將性別關注整合入經濟社會政策、增加投資在婦女身上以增強婦女就業能力、支持婦女有同等機會享有企業信貸與創業發展、提倡就業密集的公共投資、提倡婦女享有同等社會保障機會。

〈三〉(中)高齡就業－留住經驗智慧

（中）高齡就業重點應在於留住經驗智慧，但台灣急需營造高齡就業的友善環境，政府與企業也都要提出鼓勵高齡及退休者繼續就業的相關措施，包括 1.提供高齡者充電學習新知與新技能的機會；2.職務再設計，有助於高齡工作環境與工作條件；3.提供職前與在職訓練，不只針對失業者還包括所有在職高齡工作者；4.

開發部分工時與職務分攤（job sharing）工作機會；5.注重（中）高齡婦女就業與創業；6.發展社會事（企）業，創造在地就業機會（郭振昌 2012）。

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12b）提出積極老化政策不應只限於給予高齡勞工財稅誘因，也應包括下列支持性措施：1.不鼓勵提早退休；2.激勵學習與訓練，避免技術過時；3.依高齡特色而調整工作環境；4.工作能有報酬；5.保持良好健康；6.給予老人照顧。尤其政府必須針對高齡勞工與企業做出適當的政策回應，因為只靠市場力量本身，是不可能有效且公平地產生想要的結果。

〈四〉工作新貧與失業者－協助所得提升與尋職

工作新貧與失業者的就業協助重點在於所得提升與尋職。針對工作新貧族，不論政府、企業或地方都應協助他們能完全納入就業市場而提升所得。針對失業問題，辛炳隆（2011）則指出金融危機後政府各項促進就業方案都是以降低失業為最高甚至是唯一目標，卻忽略當前失業問題的本質變化，無法使政策資源做最有效運用；故主張要釐清失業問題的多樣性，針對不同類型失業者需要提供適切就業/失業服務：除了加強尋職服務外，失業者所得中斷問題可以失業給付或失業救助解決，失業者人力資本閒置與折舊可透過公共就業或補貼政策解決，人力資本折舊也要透過教育訓練解決。針對〈中〉高齡就業/失業問題，馬財專（2010）建議提升勞動參與意願、強化就業媒合、建構多樣化及區域性職業訓練體系，並以工資補貼政策配合。至於青年失業問題，我們建議應實施上述 OECD 建議的青年就業政策，改善青年就業與失業問題。

陸、結論

本文提出後金融危機時期唯有建立創新性就業指標和全方位就業發展的新思考，才能有助於重新思考就業新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為創新性就業指標建立要

針對勞資政三方做整合調查分析，提供勞動市場即時資訊分析系統，才能釐清就業市場與就業群體的新問題。全方位就業體制發展新思考則主張改革金融資本主義讓經濟真正復甦與就業活化，以及整合企業、政府與公民社會資源使青年、婦女、（中）高齡與工作新貧族都能納入就業市場。OECD 最新資料顯示各國就業率仍較危機前低而且失業率居高不下，ILO 也指出青年失業率高且臨時工經驗無助青年就業。故過去 20 年各國金融與勞動市場改革，在後危機時期已再度面臨重大改革時刻。只是這一次與過去國家大幅解除管制市場很不一樣，在於重新找回國家角色（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管制市場，包括金融市場不當運作和勞動市場不當雇用與開放；讓經濟重回正常軌道運作，就業也將隨之回溫。經濟與就業是一體的兩面：就業是經濟的基石，經濟又是就業的先決條件。但資本主義經濟過度市場化的惡果，已導致自我毀滅的過程。我們認為當前就業問題不只是就業本身，其根源在於經濟，故急須創新性思考與做法，形塑金融與勞動市場再改革的新契機，才能成功脫離當前就業/失業泥沼。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台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 Yo-Yo 現象〉，《臺灣社會研究》，第 67 期，頁 105-152。
- 李碧涵、徐健銘（2010）。〈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的批判：發展理論的新領域與社會發展研究的新議題〉，論文發表於《第二屆發展研究年會》。2010 年 11 月 20-21 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 辛炳隆（2011）。〈後金融海嘯時期就業政策應有之調整〉，《臺灣勞工季刊》，第 25 期，頁 22-31。
- 馬財專（2010）。〈臺灣中高齡勞工失業問題之檢視及政策思考〉，《臺灣社會福利學刊》，第 9 卷第 1 期，頁 45-95。
- 郭振昌（2012）。〈台灣高齡化趨勢與（中）高齡者就業政策措施〉，主題演講，《一老有所為在台灣－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2012 年 2 月 9-10 日，台北：臺灣大學社工系館。
- 鄭凱文（2010）。《台灣青年非典型工作者的新興就業方式：飛特族(Freeters)與SOHO 族之比較探討》，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凱文、李碧涵（2010）。〈臺灣青年非典型就業之探索性研究：飛特族(Freeters)與蘇活族(SOHO)之個案分析〉，論文發表於《人口變遷與社會發展：2010年臺灣人口學會年會、社會發展指標、及時空人口學研究聯合學術研討會》。2010年4月29-30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謝文元、李易駿（2007）。〈缺乏保障的就業：青年非典型工作經驗之探討〉，《政大勞動學報》，第21期，頁1-53。

外文部分

- Cazes, Sandrine & Sher Verick (2010).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 in Watt, Andrew & Andreas Botsch (eds.), After the Crisis: Toward a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Aisbl: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1.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a). EU Employment and Social Situation, Quarterly Review (June 2012).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b) Social Europe e-newsletter 01/2012.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ILO (2009a). Tackling the Global Jobs Crisis: Recovery through decent work polic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09b).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May 2009 updat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1).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1.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a).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2: Preventing a deeper jobs crisi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b).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2: Better jobs for a better econom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c).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d). Gender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Part-time Work in Developed Economies (Chapter 1 B). I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7th Edi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e).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7th Edi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and WTO (2011). Making Globalization Socially Sustainabl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Lee, Bih-Hearn Virginia, Lih-Rong Lillian Wang and David Fu-Keung Ip (2011).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Atypical Workers: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4(1) (March): 103-120.

- Mandl, Irene (2009)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ienna: Austrian Institute for SME Research.
- OECD (2010).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Head of OECD Publications Service.
- Schmid, Günther (1998). Transitional Labour Markets: A New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discussion paper (FS I 98 – 206). Retrieved May15, 2012 at <http://skylla.wzb.eu/pdf/1998/i98-206.pdf>
- Schmid, Günther (2008). Full Employment in Europe: Managing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nd risk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Torres, Raymond (2011) Editorial. In ILO & ILS,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1, pp. vii-xi.

Overcoming Post-Financial Employment Crisis: New Indicators and Holistic Thinking in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avid Fu-keung Ip^{*}, Virginia Bih-hearn Lee^{**}, Alice Lin^{***} and Kimco P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unless a holistic view of considering employment is taken and new indicators are created the current global post-financial crisis employment problems in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period will not be solved. It first surveys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ow it has changed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promoted jobless growth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workers. For this reas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new employment indicators must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integrated data derived from the age and gender of workers, their forms of employment and the sector of employment so that a clearer picture of labour market and employment problems can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can be developed. This study further argues that what is required for overcoming the unemployment conundrum are radical reforms and r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and labour market so tha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young people, women and older workers can be enhanced and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sectors can no longer abscond from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making life easier for the working poor.

Keywords: post-financial crisis,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new employment indicators, holistic employment development, radical reforms of labour markets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Head,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 Assistant Professor,